

摇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 轱子云著 援上海 文汇出版社 圆园园缘年

摇(文汇原创丛书)

摇陈岸尧著 援上海 文汇出版社 圆园园缘年

摇 I 援我援我 II 援李援我 III 援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摇 IV 援云援我援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圆园园缘)第 员圆圆缘号

· 文汇原创丛书 ·

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

作者 轱子云摇 丛书主编 轱关鸿

责任编辑 轱飞雪摇 申摇月摇 装帧设计 轱夏萍

出版发行 轱 匪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 苑缘号摇 邮政编码 圆园园园)

经销 轱 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 轱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 轱 装订 轱 上海浦东联印刷厂

版次 轱 圆园园缘年 员月第 员版摇 印次 轱 圆园园缘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开本 轱 圆园 伊 圆 厘米摇 员 员 员 摇 字数 轱 圆 千

印张 轱 援 援 摇 印数 轱 一 圆 圆 圆

陈岸尧著 援上海 文汇出版社 圆园园缘年 定价 圆 圆 圆 元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辉煌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

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 ,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 ,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 ,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 ,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 ,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 ,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 ,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 ,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 ,一种呼吁 ,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一起来呼唤原创作品 ,推动原创作品 ,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 ,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目摇录

记长者夏衍 轲园

文艺漫谈 轲园

人、风格和兴趣

摇摇——观“夏衍捐赠字画展”所感 轲缘

与夏公聊天 轲缘

一颗燃烧的心

摇摇——巴金《随想录》读后 轲园

反封建的勇士巴金 轲苑

无欲则刚

摇摇——记柯灵 轲怨

见识、良知和勇气 轲园

淡泊明志摇宁静致远

摇摇——冰心印象 轲园

探病中周扬 转页愿

童心不泯

摇摇——记吴强 转页愿

好人冯牧 转页愿

书生荒煤 转页愿

《失态的季节》和王蒙 转页愿

田念萱和她的客厅 转页愿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 转页愿

仁者之风

摇摇——记钱谷融 转页愿

聂华苓和安格尔 转页愿

於梨华和她的《别西冷花园》 转页愿

我看王渝 转页愿

送洪泽同志远行 转页愿

张光年和《五月的鲜花》 转页愿

我只写我所目见耳闻(后记) 转页愿

附录 转页愿

记长者夏衍

当我第一次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之约编一本夏衍的专题选集的时候，几位至亲好友就提醒我：你在宝山之旁而不知探宝，你应该认真收集、研究夏公的生平和创作。是的，我早就该沉下心来从事夏衍研究了。从 1929 年我走进革命的队伍，夏衍同志就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革命老前辈之一，就从事文学活动方面来说，他又是我的引路人。虽然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在后来的近三十年中，除去那失去人身自由的十年，他一直不断地指点我（让我多看杂书）、批评我（批评我文章干瘪拘束）。作为一个长期受教的晚辈，朋友们的这个建议，对我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却又非常不容易。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化巨人们的活动与成就，大多不局限于文艺范围之内。他们不仅仅是新文艺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而且还在其他方

面做出了贡献,有时直接投身政治活动。鲁迅自不必说,郭沫若、茅盾无不如此。夏衍也不例外,除文学、戏剧、电影之外,他还是新闻、外交、党的工作等方面的活动家。要研究他,必须研究与他活动相联系的现代史、党史、文学史、新闻史……那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我不禁望而却步。

近几年来,我每次出差到北京,总要千方百计利用有限的时间多去看望他老人家几次。坐在他那间只有八九平方米,被极其简单的旧家具塞得拥挤不堪的斗室之内,或者聆听他对于当前的文学、当前的电影发表意见,或者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俯身于小桌儿上走笔疾书,每当这种时候,特别是当他写了一阵之后抬起头来,将左手插在右腋下,燃起一支烟,皱起眉头“苦思”的时候,三十五年前在上海河南中路上的文管会用木板隔成的简陋的办公室中,以及后来在常德路、淮海中路上的宣传部的堂皇的办公室中挨烟熏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那时,做小秘书的我,每天就是在烟气迷蒙之中强睁着被刺激得睁也睁不开的眼睛,诚惶诚恐地拆复信件、记录电话、收发整理文件。这些回忆,倒使我产生了一个愿望:在对他进行全面研究的课题面前我胆怯,那么不如就将自己对于这位前辈的点滴印象,从他为文为人方面所得到的感受,以及自己从他那里受到的教诲如实地记述下来。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接触到夏衍同志的作品是在 1949 年底,临近上海解放的时候。那时一个中学同学正就读于上海剧专,他们排演了夏衍同志的《芳草天涯》,邀我去看。

当然,夏衍这个名字,那时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从高中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开始,大家就逐渐熟悉起一些革命文化人的姓



夏衍 摄于日本

名,不过,当时我们最熟悉的主要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文艺作品,以及它们的作者,因此,尽管我读过开明书店那种用脆薄的土黄纸张印的《母》,但是我没有弄清译者孙光瑞就是沈端先,亦即夏衍的另一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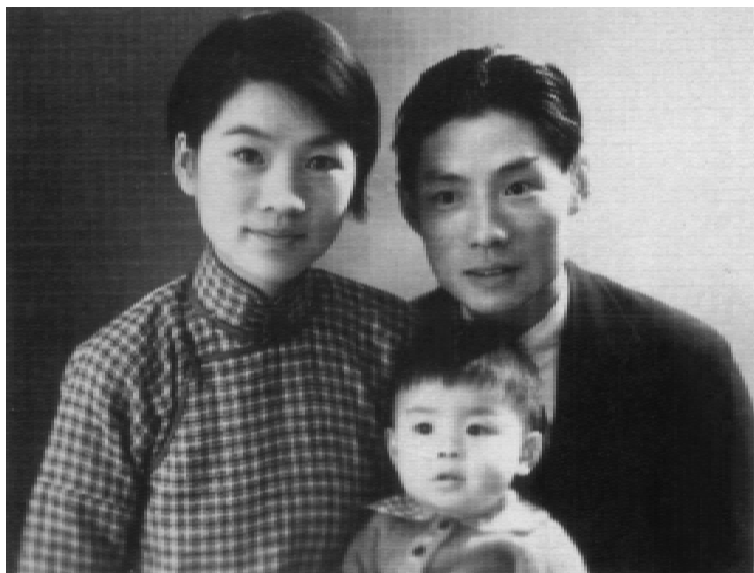
1935年底,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青年学生们正沉浸于革命狂热压倒一切的情绪之中,我当时方迈出中学大门不久,格外幼稚、偏激,刚刚在心里推倒了过去的偶像——屠格涅夫笔下的丽莎、爱伦娜,将保尔·柯察金树为自

己的楷模。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去看《芳草天涯》,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直至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走出剧场时的迷惘心情。这是一位老革命家写作出来的吗?做了革命家也还会如此儿女情长么?——原来,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是有意或无意地将革命与人情对立了起来。而《芳草天涯》却恰恰是表现了革命者的人情,这是这位未曾谋面的老革命家的作品给予我的第一个印象。

半年多之后,1949年的秋天,我就见到了夏衍同志本人,而且分配在他领导的部门工作。当我们这批来自学校的年轻人与机关领导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观剧时所感到的迷惘再次出现在我心中。他与其他来自解放区的同志一样穿着粗土布的黄军装,但是,只有他戴着当时只是在上海才有的玳瑁边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皮鞋干干净净,脚上居然还穿着一双黑丝袜!——在1949年这简直令人惊讶。而当负责带领我们这批小鬼的同志将我们介绍给他时,他既不像有的首长那样严肃而不苟言笑,也不像有的首长那样在和蔼之中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持重。他让我们觉得亲切而自然。他带着他所特有的微笑——从这微笑中我们感到他是喜欢年轻人的——津津有味地望着我们、研究着我们,特别对我们几个穿着从国民党军队仓库中缴获来的不合身的大军装的女孩子诙谐地说:这几个是儿童团嘛。周围同志的笑声解除了我们初见首长的紧张与不安。

他是位地地道道的老革命——1926年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家,但是从他的仪态举止之间所流露的那种从容、温和、幽默诙谐的气质,与周围那些神情刚毅果断、身上还在散发着硝烟气息的老革命们又那么不同。

这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几十年后,这些印象虽然得到了丰



1935年的一张“全家福”

富与发展,不过最初印象的基本之点并未改变。他宽容、豁达大度,在突然事件面前冷静自若,他对半世纪以来与之斗争的敌人时时保持着警惕,他对周围的朋友和晚辈富有同情心,他特别喜欢具有未泯的童心的天真性格,讨厌虚伪、做作与世故,尤其厌恶谄媚、逢迎、投井下石和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行为。

不喜欢他的人攻击他为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以我浅薄之见,他其实是一位富有真正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家。

在当年,作为一个刚踏进革命队伍的小兵,感受最深的是他对下属的关心——那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为每一个下属的发展前途着想的关心。在那个年代,那座由荷枪战士日夜警卫的办公大楼——建设大厦让人感到敬畏,在大楼中办公的叱咤风云的革命领导人更让我们这些小兵感到敬畏。开始在夏衍

办公室工作时,我感到手足不知所措——怎么会不感到局促呢,就连警卫员、连大楼里的公务员都比我们革命资历老得多。夏衍同志的两位警卫员谈起他们的战斗经历时,我只有仰着头听的份儿。但是没有几天夏衍同志就消除了我的那种紧张情绪。

解放大军初入大城市,本已千头万绪,加以上海解放之后,又大事不断:“二六”轰炸、三反五反、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因此,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比如,“二六”轰炸之后,我们二月七日就下到被炸得最严重的杨浦发电厂;比如后来的整理转移档案;再比如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准备等等,都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夏衍同志每次看到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离开办公室,总是半开玩笑地叮嘱率领我们工作的办公室主任:“要注意,你们可不要虐待儿童团!”于是,儿童团的叫法就传开了。他对年轻同志的关心还不仅止于生活方面,他更为关心我们的学习。对于先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位警卫员老刘和老苗,他几次批评他们打扑克、吹牛、无所事事地混日子,说服他们学文化、学“一技之长”,老刘终于在 1950 年从工农速中进入技术学校。我的走上文学道路更是和他的教导与鼓励分不开的。在听电话管文件之余,我有时也看看作家们送给他审阅的剧本、稿件,有时还跟随他去看审查演出,常常在他们讨论时充当记录。在讨论会上我当然一语不发,而有时在会后,我向他悄悄提出自己的疑问或我所感到而会上没有讲到的优点或缺点。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位有威望的革命文艺前辈面前,讲述自己的幼稚的看法需要多大的勇气。而这位前辈,居然每次都仔仔细细、认真地听下去,有时还问到我在读的新出版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及我的看法。那是在 1950 年,一次,他对我说:“你应该把你对作品的看法写成文章。评论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你写好给

我看。”当时，我屏息静气，激动得不知所以——我们这种心情大概是今天的年轻的朋友们难以理解的。在我们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时候，不要说对夏衍同志这样有着传奇式的斗争经历与很高的文学声望的近五十岁的革命家，即便对三十岁的来自解放区的同志，我们也看作是老同志，佩服得不得了。——也可以说，就是夏衍同志这句话将我引上了文学这条又苦又甜的道路。尽管当时身为市委五位常委之一的夏衍同志是那么忙，但是我最初发表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评论文章和散文大都经他看过，有时还经过他修改——可惜当年我还不爱惜这些笔墨，没有将它们保存下来。每当看到我的一点点进步，他就鼓励我。现在许多知名的作家当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缺乏自信的人，如果没有周围几位长者不断的鼓励与督促，我大概不会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来，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文革”之后，我见到当年一起在夏衍同志身边工作的警卫员老刘和老苗，大家都感到夏衍同志在学习方面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使我们终身受益。

夏衍同志非常爱才。爱才，这不是夏衍同志一个人的特点，我觉得我们许多革命前辈——那些胸怀大度而充满自信的领导人，都爱才。而夏衍同志特别爱有才气的年轻人，不论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记者，有才气的他都爱护。因而他身边总是有一批隔一代、隔两代、甚至隔三代的（按目前电影界的说法，那就是第五代了）忘年交。

他在上海工作时期，每次去北京，他就被“二流堂”及其“弟子”们包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拿出《人民日报》整整一个版面来揭露“二流堂”的所谓罪行。那篇杀气腾腾的檄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在列宁格勒广场

文将“二流堂”说成是个不仅是有纲领、甚至还有堂徽的反革命组织。其实这不过是一群才气横溢、富有幽默感、不拘小节艺术家，诸如吴祖光、盛家伦、郁风、黄苗子、丁聪、戴浩、唐瑜等位的聚会而已。这些都是从抗战时期开始团结在夏衍同志周围的活跃的剧作家、声乐家、画家、电影家。他们都是夏衍同志的“晚辈”。而到这时，在他们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更年轻的、吴祖光的“弟子”们，那就是第三代了。只要“夏公”一到，他们就海阔天空，“喜怒笑骂”一番。对当时文艺界的、以至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的讽刺挖苦之词，简直可以收入侯宝林的相声之中。夏衍同志常常从这些人的言谈之中了解到各种行当的艺术家的意见和情绪。后来，他在上海干脆摆了一个“测字摊”来听取文艺界的意见——每星期固定一个晚上在作家协会东厅接待文艺界人士。每次，我坐在边上，当然不敢开口，只是聚精会神地听，从那些如珠的妙语中我悟到什么是文化人，什么是艺术家的机智与尖刻。

当然，这些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有人很不喜欢这种表现，而夏衍同志却很看重这个。他从这里发现艺术家的才气与激情——只有对社会、对生活、对艺术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种激情。因此，他宁可欣赏这种不够全面公允的“尖刻”，也不喜欢不见才气的四平八稳。在我接触到的老前辈中，大概只有少数人具有这样宽宏大度的胸襟。

是的，爱才而宽容，我觉得用这句话说明、概括他为人的一个方面是很恰当的。为了出自爱才的宽容，他受过多少指责！在解放初期那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形势下，连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都开展了如火如荼的讨论，他居然公开肯定张爱玲的艺术才气，并通过几位作家、电影导演、报界人士劝她

不要离开大陆，还亲自筹划对她的安排。出于种种原因，张爱玲还是走了。他得知之后，惋惜地对我说：“这是一位艺术家，你应该读读她的小说，她所反映的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阶级的生活是相当深刻的。”~~1954~~1954年他在上海华东医院接见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时，我陪同在座。当於梨华谈到张爱玲现隐居美国时，他对她说：“你再见到她时，请代我问候，并欢迎她回来看看。”这两年，国内掀起了张爱玲作品热，而在当年，谁敢仅仅为了艺术才气而肯定她呢！要知道这是一位出身于清末名宦家庭，成名于沦陷时期，写的又全是十里洋场没落的半宦半商家庭的男男女女的纠葛的作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家庭、个人、作品，都是与革命离得远而不能再远的了。

关于夏衍同志爱才的表现实在不胜枚举，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例。那就是一位有成就的女演员，由于家庭中婆媳长期不和，做了蠢事，引起了政法部门的干预。这类纠纷，处理上处于可宽可严之间，夏衍同志又冒了舆论的危险，从中调停。他看出了我当时的担心与不解——这类事他完全可以不管，他对我说：“这是个有才华的演员，我如果不出来讲讲话，说不定她就会毁了。当然，我这样做可能会遭到非议。但是，这根鞭子如果打在我身上，我也许也要受到一些皮肉之苦，但，挡一下就过去了。”是的，在那个年代，栽一个跟斗就一蹶不起、毁了一辈子的事并不少见。夏衍同志这样的为人舍己的品格，让我感到肃然起敬。后来，我还见到几桩他为了触犯常规的干部排除困境的事例。在那个人人口头上号称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从严、处理从宽”，而实际上越是主张“从严处理”才越显得革命的时代，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夏衍同志正是在这种甘冒风险中显示出他的长者风度的。

果然,这些事——无论是“二流堂”,还是张爱玲,以及他曾保护过一些艺术家和干部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清算”了出来。在干校的草棚棚的宿舍里,我听着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一位小将躺在地铺上,咬牙切齿地读着这些“黑材料”时,我默默地想:你们这些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黑心鬼们,怎么能了解一个宽厚的革命者的心呢!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他已吃过许多苦头,但他“童心”未减,初衷未变,我几次去京看望他时,总是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接待有才气的年轻人和为他们说话。对于现在在电影界已经知名的会林、绍武和李陀、张暖忻,他都曾用他那因白内障而弱视的眼睛,费力地阅读过他们的作品,热心地给他们提过意见、支持过他们。直到现在一讲起李陀,他还叫他孟克勤(李陀的原名)。有些年轻作家在探索过程中遭到非难,他常常不邀而至地出来为他们“打抱不平”。有人以为是什么人动员他出来为年轻人讲话,其实,这完全是他自己兴之所至、主动为文,向编辑部投稿的。对于年轻人的有些艺术见解,他不一定完全同意——他更多地重视艺术上的群众观点,但是他坚决地支持探索与创新,表现了明智与开通。尽管也许是有些年轻人已经走到了前面——也应该如此,只有这样事业才能向前发展,而对于曾经为我们挡过棍子、用肩头顶住闸门放年轻人过去的长者,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在为别人讲话上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写的那篇回忆杨度的文章,1985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看望他,他正伏在小几上艰难地写着,见到我来,就叫我帮他誊抄。那几天他似乎极忙,来人、电话、外事活动接连不断,我又缺乏现代史的知识,不知杨度其人,就劝他说:“您还得自己多加保重,有些应景文章能推就推掉

吧！”他说：“有些话得赶快帮人家说清楚，不然以后查考起来就麻烦了。杨度入过党的事，周总理已不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这些事得对人家负责。”

为别人着想，讲公道话，支持年轻人，这大概是他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则。

粉碎“四人帮”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 1976 年 9 月来上海的时候。当时，他虽然已经得到平反，但有些“左”派人士还在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四条汉子”，甚至还把“四条汉子”与张春桥（狄克）拉扯在一起批。因此，他是悄悄地来到上海，住在他姐姐家的。到上海的当晚，他的儿子沈旦华来通知我，不巧我不在家，我回来后自然懊恼不迭——天太晚了，当晚不好再去打扰他。次日一清早我就跑去了。虽然对他的情况我已有了一些了解——他过去的警卫员老刘每次过京都去他家探望，从他那里先了解到他一些情况，后来 1976 年夏“四人帮”覆灭前夕，他女儿沈宁带了孩子们来上海避地震，住处离我家非常近，几乎朝夕见面，她更为详尽地讲述了她们全家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的遭遇，尽管如此，当我实地看到他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位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入党，一辈子出生入死的革命老人，被“自己人”打断了腿，成了这样拄着拐杖的残疾人的时候，我仍然觉得难以接受。握着他老人家的手，望着那越发清瘦的脸，此时的心情，惟有悲愤二字而已。

尽管我激动得语不成句——一肚子的话想同时倾倒出来，千头万绪，不知先讲什么是好，他却仍然安详平和一如既往（他的开始急躁是近两年的事）。他仍然挂着那他所独有的令人感到亲切温暖的微笑，他仍然首先关心别人的遭遇，一一探询上海